

容 闳 述 论

袁 鸿 林

《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涯》^①一书的作者容闳，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失为一个比较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在八十四年的漫长生涯中，容闳的不少活动和主张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等起过一定的作用，有过相当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一个学习西方的先驱和爱国者，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拟对容闳一生的思想概貌和主要活动进行论述。

爱国维新思想的形成

容闳是最早系统地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国人。1828年11月17日，他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的一个普通贫寒的农家。从1835年起，他在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办的教会学堂肄业三年余。1840年11月，他又入玛礼逊教会学校，于1846年底毕业。翌年初，他随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国留学。在美八年，他先后在麻萨诸塞州的芒森学校和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1854年毕业于耶鲁，得文学士学位（1876年耶鲁又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

长期所受的系统西方教育，使容闳广泛涉猎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且还使他亲身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目睹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了解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从而又使他形成了西化的性格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因此，当他回首面对中国的现实时，便深感祖国的落后和危机：国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1909. 其中文旧译本《西学东渐记》漏误甚多，故本文引文除特别注出外，均译自英文原版，下略作“容自传”。1969年日本出版了日译本《西学东渐记》（百瀬弘译注、坂野正高解说），下略作“日译本容自传”。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其号又作纯父、纯圃、淳甫、春浦、纯斋等。

家和民族处于被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地位，经济和科技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朽没落等等。同时他也深感自己肩负着救国救民的责任。“在整个大学时期，特别是最末一年，中国的可悲情形”成了他“精神上的沉重负荷”，如何利用学到的知识来为祖国谋福利，是他经常冥思苦索的问题。^①他曾在1852年的一封信中说：“如果住到1854年夏，我将获得文学士学位，此后我将考虑回国并仔细考虑将来的职业。谈到职业，还无一定结论，但有一点已确定，我将来要学习农业化学，我也许去学习内科和外科医学，对于想为祖国谋福利的人来说，有那么多东西——而且每一种都那样具有价值，以致要想知道应该选择哪一种，是太难了。”^②

事实上，他也始终没有选定上述某种职业。他显然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要改革中国，必须把眼光从自己转向整个社会。因此，以后容闳始终致力于各种进步的社会活动，成了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当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造就一批从事改革和近代化的人材，认为使中国的青年一代获得先进的西方教育至为重要。他说：“在大学最末一年结束前，我对以后的事业已规划了草图。我确信中国的新一代也应当享受我所受过的教育利益；通过西方的教育使中国得以维新，文明强大起来。”^③这时在他的头脑中已酝酿着留学生计划^④，并把派遣留学生当作改革中国的一种手段。他后来的维新思想即是以此为出发点，逐渐形成起来的。

大学毕业后，容闳放弃了在美国谋求优越地位的机会，满怀着重维新祖国的抱负和希望，于1855年回到了祖国。可是，在归国后的最初五年中，严酷的现实不仅使他无以实现自己派遣留学生的救国计划，而且奔波五载，屡迁其业，所见所闻，尽是难以言状的黑暗和污秽，思想深受刺激。于是，他抱着对太平天国同情

① 容自传，第40—41页。

② <1852年12月30日容闳致卫三畏函>，英文未刊手稿，藏耶鲁大学图书馆。

③ 容自传，第41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代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的态度和试图通过太平天国来推行自己改革方案的期望，于1860年11月18日到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并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七条改革建议：“一、按科学制度组织军队；二、建立一所军事学校以培养有能力的军官；三、为海军建立一所海军学校；四、组织一个民政政府，由富有才干和经验的人在各行政部门充当顾问；五、建立银行体系，制定度量衡标准；六、建立面向民众的年级制学校教育制度，采用《圣经》为课本之一；七、建立一系列实业学校。”他还表示：“我十分乐意为帮助贯彻这些措施而效力。”但通过实地考察，容闳觉得洪仁玕当时“孤立无援”，而“根据领导人的行为、品格和政策来判断，对于他们最后能否取得胜利，我十分怀疑”。他看出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暮气日深的情形。^①他终于谢绝了洪仁玕的挽留，失望地离开了天京。

容闳的天京之行在太平天国史上并无实际影响可言，但他的上述七策作为最早的资产阶级维新方案，在中国近代史上则颇有意义。这七策是一个以模仿西方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方案。它企图通过太平天国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这方案有四个方面的改革内容：

一、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civil government”，这是一个多义词组，从前后文看，可译作“民政政府”，似指一种君主立宪政府，源于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治学说。^②洛克认为，君主专制不是一种民政政府，因为不存在裁定君主和臣民之间争执的中立权威；民政政府是社会契约的结果，君主立宪是它最合适的制度，可以保护财产、自由、平等这些“不可转让的人的自然权利”。

二、在经济上，提出了模仿西方创办银行和制定度量衡标准。

① 容自传，第109—110页。容闳访问天京并非出于偶然，早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对太平天国运动非常关注，曾写信给在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请立即告诉我这次革命的情况，我对他所有的活动都极感兴趣。”（1853年7月27日容闳致卫三畏函，英文未刊手稿，藏耶鲁大学图书馆。）

② 日译本容自传译作“文官政府”，旧译本《西学东渐记》译作“善良政府”。洛克（1632—1704）的政治学说集中地表述于1690年发表的《关于民政政府的两篇论文》（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n Civil Government）一书中，此书汉译本名《政府论》。

这些有利于促进经济和发展资本主义。

三、在军事上，提出了用模仿西方创办军事学校的方法，来使太平天国培养出一批军事素质较好的军官，从而建立起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开办军校，这无疑是国防近代化的步骤之一。

四、在文化教育上，提出了民众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年级制教育这些近代西方的先进事物。实施这些教育，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和培养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近代国防、科技人材。从学习西方而进行改革的角度来看，应当承认，迟至在天京提出七策时，容闳的爱国维新思想已基本形成，并且，是处在当时一个相当的高度而闪烁着光彩的。不过，也应当看到，容闳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获取的不全是积极的东西，他也还受到它的消极影响。后者模糊了他的视野，使他不能比较全面、比较深刻地认识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如他在自传中时常赞扬那些不该赞扬的外国传教士，反映了他对列强侵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侵略，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认识。而且，我们很难在他的维新思想中找到从正面明确反帝的主张。同时，学生时代的特殊经历和当时具体的时代背景，也使容闳的社会关系显得复杂。他交往的人，有不少是外国的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还有一些中国的买办。这些社会关系也对他产生了一些直接的消极影响。如在决定谢绝洪仁玕的挽留前，他曾与同行的外国传教士作过商量。即使是时代的先进者，也往往是通过这样那样的弱点同他们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

洋务时期的活动、主张以及与洋务派的关系

（一）

容闳自美归国伊始，就欲结识清廷大员，以便游说他们采纳他的维新方案。在对太平天国失望后，容闳便转向洋务派，多方设法，主动攀上了曾国藩的关系，于1862年夏到了安庆的曾国藩军营^①，从此与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发生了长达近二十年的关系。

^①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简辑》第三册第228页。

在这期间，他的主要活动和主张，可归纳为以下十个方面：

一、提出工业近代化的初步方案和赴美购买机器。1863年11月，容闳在安庆得知曾国藩想办兵工厂后，便向曾提出了一个“机器母厂”的计划，以变单纯的兵工厂为“能制造专门机器的普通基础性”的工厂。容闳设想通过这个机器母厂产生更多的机器厂，奠定机器制造业的基础，而且该厂不只是生产枪炮和机器，还要利用“比欧美廉价的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生产民用商品，抵制外国商品的输入。^①这无疑是代表了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经济要求的“商战思想”，也是中国最早的工业近代化建设的初步蓝图。为实施这个计划，他接受了曾的委派，于1864年初赴美购买所需的机器，1865年购回各类机器“一百数十余种，交上海制造局收存备用”。^②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机器设备。

二、提出在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的设想。1867年，他又向曾国藩提出在江南制造局附设一所“机械学校”，计划“在这所学校里中国青年可受到机械工程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教育，这样使中国能及时免于雇佣外国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而能完全独立自主”。^③这说明，容闳不仅考虑到在引进先进设备时必须引进相应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而且还特别提出了教育为独立自主方针服务的先进思想。

三、译书。在1865年11月至1866年5月间，容闳曾翻译了美国人哥尔顿(Walter Colton, 1797—1851)的一本游记和美国法学家派森(Theophilus Parsons, 1797—1882)著《契约法》的大部分。^④这反映了他曾有介绍西方知识的启蒙意图。

四、提出中国商人的第一个轮船公司方案。1867年春夏间，容闳在上海发起筹组华商轮船公司，并正式拟定了章程，转呈总

① 容自传，第168—169、154页。

② 《出洋委员容闳请奖片》，《曾文正公全集》卷二十五。

③ 容自传，第168—169页。

④ 容自传只说“哥尔顿的地理学”和“派森的契约论”，未标出作者和书的全名。此据百川弘先生的说法，见日译本容自传，第155—156页。

署。①章程体现了新兴资产者的要求，在集股、管理、分润等方面基本仿效西方企业的方式。此公司系一纯粹民营的企业，其理想是以自由竞争的精神发展本民族的轮运业和商业，打破外国洋行的垄断局面。1868年，容闳在通过丁日昌转呈总署的条陈中，又重提华商轮船公司事，并进一步要求承担漕运。②由于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和其它一些原因，这个纯粹华股公司并未能组织起来。不过容闳的倡议对后来轮船招商局的开办，显然有所影响。

五、倡导派出第一批留美学生。在上述通过丁日昌转呈总署的条陈中，容闳第一次将怀于胸中十余年的留学生计划向清政府提出。他认为，应选派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留学③，但当时未被清政府立即接受。1870年，容闳又找到机会重提派遣留学生，是年冬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872年至1875年，共派出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也是中国大规模直接向西方学习的开端。容闳自认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事业。

六、在故乡办学。容闳在为派遣留学生一事奔走的同时，也曾任故乡南屏乡宣传办学，并于1873年正式建成“容氏甄贤学校”（现为南屏乡小学）。④

七、购买枪炮。1873年春，容闳为购买美制新式格林炮专程返国，后经李鸿章同意在美订购了十万美元的五十尊炮。1878年秋，容闳捐款13,133元英洋（加上叶源濬、容增祥各捐1,500元，共计16,133元英洋），购买了一批美制枪炮弹药。⑤

八、办报。1874年6月16日，由容闳发起在上海创办了《汇报》。这是一份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的新式报刊，它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反对外国的侵略。⑥

九、保护华工。1874年8、9月间，容闳曾“密往秘鲁查访华工情形”。他在利马选录了十多名受害华工的供词和若干呈词，又

① 容闳：《拟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872—875页。

②③ 容自传，第171—175页。

④ 《容氏甄贤学校碑铭》，《容氏谱牒》卷十六。

⑤ 《叶源濬容增祥请照原保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一。

⑥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61—64页。

证以美国驻秘鲁公使及居秘美侨的信函、证词等文件，呈报总署。容闳的确凿证据迫使秘鲁国钦使不得不承认华工受迫害的事实，并在照会中保证“实力保护”华工。^①1875年底，容闳被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钦差副公使（陈兰彬为公使）。1878年发生了美国同孚洋行为秘鲁拐运华工案，容闳会同陈兰彬照会美国，对此提出抗议，积极进行交涉。^②1879年和1880年容闳曾分别就美国排华事件向美国总理外务大臣提出照会。^③他的这些外交活动，完全站在爱国的正义立场上，坚决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十、赞助郑观应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此局是从1876年就开始筹建的中国第一家棉纺工厂。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抱着“商战”之志，在1880年再度入局“主持大纲”后，给时在美国的容闳去函求助。^④容闳积极予以帮助，为郑物色了美国人丹科，协助郑规划建厂。

上述十个方面的活动和主张，体现了容闳的如下宗旨：一、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技术、武器等；二、注重开展文化教育等资产阶级启蒙活动，培养从事近代化事业的各类人材；三、热情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四、反对外国侵略、捍卫民族利益。总的目的是使祖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近代资本主义强国。这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基本内容，充满了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突破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框框。在思想宗旨上，容闳与洋务派有很大不同，简直是同床而异梦。

不过，他既入洋务运动，则势必受到洋务派的束缚和利用，如容闳购买的枪炮就难保不被用于对农民反抗斗争的镇压。何况，容闳还往往把实现其改革方案的大部分希望寄予洋务派主持的“自强新政”，这种幻想使得他十分依赖洋务派。这反映了早期维新派缺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理论准备，而该派本身又不成其

① 《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秘鲁招工》，原档七册，存北京图书馆，未刊。

②③ 朱士嘉：《美国迫害华工史料》第49、60页。

④ 郑观应：《致容纯甫星使书》，《盛世危言》卷七，第13页。

为了一支独立的队伍，因此只能依附于洋务派而在历史舞台上有所活动的历史现象。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可供容闳当时选择的其余地也并不存在。

(二)

容闳在宗旨上虽与洋务派不同，但又不能不依附于洋务派而有所作为的特点，充分反映在他与洋务派之间的关系上。这一关系具有既互相依赖利用又互相猜忌矛盾的复杂性，最后因为宗旨的不同而激化矛盾，两者终于分道扬镳。

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迫切需要并竭力广泛搜罗洋务人材。熟悉洋情、精通英语的容闳一到安庆，便被曾国藩借重。曾国藩曾想请他出洋广招技术人员来华协助创办兵工厂。^①但容闳对曾最初要办的兵工厂并不感兴趣，如前所述，他第二次到安庆后，提出了办一个机器母厂的计划，认为可先引进一些工作母机，即“制器之器”。这对曾很有启发，曾在日记中郑重其事地写下“制器之器”这个新名词，并派容闳出洋购买。^②容闳接受曾的委派，其动机除了想使中国有一个初步的基础工业外，还希望以此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以便来日获得机会，通过曾的支持来实现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如果说容闳与曾国藩是两个起点和终点都不一致的旅行者，那么，现在却因为各自不同的需要暂时走到了一起。容闳与洋务派的关系，一开始就是互相利用。

互相利用进而为互相依赖。容闳认曾国藩为无与伦比的伟人，视丁日昌为情意投契的至友，把他的维新计划一一向他们条陈，反映了他对洋务派的依赖。而洋务派方面，也对容闳十分重视，曾国藩对丁日昌说：“徐委员所造轮船，独开生面，容委员所购机器，……其事（即）今日不可少之务，其人亦即为中国可造之才，惟须阁下主持调护……”^③李鸿章也认为容闳“洋学及西国律法探讨颇深，洋情既熟”，因此，无论是重要的对外交涉还是一般的

① 《复郭筠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

② 《曾文正公手书记》卷十八，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③ 《复丁雨生都转》，《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64—265页。徐委员即徐寿，容委员即容闳。

洋务事宜，多次认为容闳去办颇为合适。^①

洋务派在利用倚重容闳的同时，又对他怀有猜忌。如容闳在上海筹组华商轮船公司，正期盼曾国藩给予支持的时候，曾却在致总署函中表示对此公司的纯粹华商性质持怀疑态度：“果否是华商集事？保无洋人及买办在内？殊难究悉。若无此辈，未必能仿照外国公司办法。”并要求上海道应宝时“留心查访具复”。^②曾国藩何尝不了解容闳完全具有“仿照”的能力，不就是他本人保荐容闳熟悉洋情而遣派赴美购买机器的吗？曾的态度只能说明他反对这个轮船公司的筹组，同时对容闳也有猜忌，认为他并非完全可靠。随着时间的推移，洋务派对他日益疑忌。

洋务派把容闳视为异类，丝毫不足为奇。容闳不仅无功名，不懂“子曰诗云”这一套，并且自幼笃信基督教，后又娶美国人为妻，如此西化之人，洋务派再开化，也是不能引以为同类的。容闳虽然对洋务派幻想甚大，但毕竟因为思想宗旨不同、文化类型各异而无法与洋务派以诚相见。反映容闳与洋务派矛盾冲突最典型的事例是幼童出洋肄业局的裁撤。

从一开始酝酿选派留美学生，容闳就与洋务派有分歧。与后来各批留学生的情况相比较，容闳的留学生计划有两点可算作特色的。一是学生年幼（10至16岁），二是学习期限长（15年），很明显地表示了容闳的用意在于：因为这些学生年幼无中学根底，可塑性就很大，如长期在美国生活，受到系统的西方教育，可使他们成为西方型的新一代。可是，洋务派经过再三斟酌定下的规制则强调留学生“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并在礼制上规定“每遇房、虚、昂、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③

容闳无力改变洋务派的定制，但在具体管理留学生时，他仍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九；《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九。

② 《海防档甲·购买枪炮》第876页。

③ 《应办事宜六条》（曾国藩、李鸿章联衔具奏），《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九。

按照自己的宗旨和西方教育的方法去办。因此,这些留学生渐渐都不同程度地西化了。有些学生甚至“剪掉了辫子”,“皈依了基督教”。^①信教和剪辫的学生,按规定将被立即遣送回国,容闳却庇护这些学生。如1880年底,当留学生容揆已考入哈佛大学时,他却被发现入教并割掉了辫子,于是立即被取消学费,并将被遣送回国。容闳则暗中为之活动,给他留下一笔必需的费用,使他继续留在美国完成学业。留学生被令全部撤回后,容揆仍留在美国。^②

这些势必引起容闳与其他管理留学生事务的洋务派发生冲突。除容闳为肄业局副委员外,先后担任正委员的有陈兰彬、区谔良、容增祥和吴嘉善四人,他们没有一个不以容闳为非。陈在赴美后一年,即与容闳时相“牴牾”,要求总署内调。^③区也曾致函李鸿章,要求“中道撤回”留学生。^④容增祥也向李鸿章告状:“学徒抛荒中学,系属实情。由于容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⑤吴一到肄业局,便“叠函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宜裁撤”。^⑥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信中也指责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⑦最后下令要容闳“勿固执己见,……不必多管,应由子登(吴嘉善)太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⑧这里容闳与洋务派的主要分歧明确表现为两者的宗旨不同:洋务派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学得西方的若干科学技术并运用它来维持现存封建主义制度;容闳主张全面学习西方,不仅偏重西学,而且还排斥中学,支持学生接受西方的习俗,甚至不惜与中国的封建道统为敌。

有些同志认为,陈兰彬、吴嘉善之流完全是顽固派的旧学者,

① 托马斯·E·拉法格:《第一批百名中国人》(Thomas E. La 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Pullman, 1942)第38—39页。

② 拉法格:《第一批百名中国人》第45—46页。

③④ 《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回》,《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二。

⑤ 《光绪五年六月十九日复陈荔秋星使》,《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十一。

⑥ 《光绪六年四月二日复陈荔秋星使》,《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十二。

⑦ 《光绪三年七月八日复郭筠仙星使》,《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九。

⑧ 《光绪六年四月二日陈荔秋星使》,《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十二。

因而根本反对派遣留学生，于是把容闳与他们的矛盾描绘成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冲突。这与事实不符。^①陈、吴等人因留学生事而与容闳发生的冲突，纯属洋务派与早期维新派的矛盾，体现了中学与西学的对立、封建主义落后性与资本主义先进性（虽然它本身也有很大局限）的冲突。洋务派的另一要员曾纪泽后来说出了洋务派撤回留美学生的根本原因：“昔年陈荔秋（兰彬）、容纯甫率幼童出洋，纪泽侍先太傅（曾国藩）前，陈说利弊……当时言：美国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遽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中国无大益也。”担心这些没有读过圣贤书的留学生会叛离封建主义，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只为他人作嫁衣裳。^②李鸿章也主要是出于这种担忧，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同意了陈兰彬、吴嘉善的裁撤方案。^③1881年，清政府决定立即提前撤回全部留学生。

维新派黄遵宪、郑观应等人对留美学生的中道悉数被撤表示愤慨。^④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还遗憾地说：“吾同治十三年，但派学童出洋数岁，其业未就而返，故成就未几。”^⑤这里应当提一下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情意的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他在得知清政府将撤回留学生后，曾热情帮助容闳运动美国名流要人出面劝阻清政府，设法挽回。^⑥容闳在留学生被撤后，愤而退出洋务运动，与洋务派维持了很长时间的关系到破裂。

① 关于陈、吴等委员的情况，洪业先生曾在其《黄遵宪〈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诗译注》一文中有较详的稽考，可参阅。（William Hung, Huang Tsunhsien's Poem "The Closure of the Education in Americ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VIII (1955) PP.50—73.）

② 曾纪泽：《使西日记》，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29页。应当指出，这批学生归国后大部分服务于外交、军事、工交、文教等界，对祖国有一定贡献，其中还出了一些很有作为的，如詹天佑、唐绍仪等。

③ 《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回》，《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二。留学生的被撤还有顽固派的作用，本文因篇幅原因，恕不涉及。

④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900页。

⑤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二。

⑥ 拉法格：《第一批百名中国人》第49—50页。

从维新到革命

(一)

容闳自退出洋务运动后一直寓居美国。1894年，在得知甲午之战中国被日本战败后，激于爱国义愤，曾两次投书张之洞。一是主张向英国伦敦银行辛迪加借款1,500万美金，购买铁舰三、四艘，雇佣洋兵五千人，沿太平洋海岸袭击日本背部，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以便中国有暇征募新的军队并组成一支新的海军来抵抗日本。二是主张将台湾抵押给某西方国家，作价四亿美元，以获得陆海军继续与日作战的费用。张之洞接受了他的第一条主张，并派他去伦敦谈判借款。由于赫德和李鸿章、以及清廷内部其他投降派的反对，容闳在英借款未成。

1895年夏，容闳又回国面说张之洞，希望由张出面说服清政府采取一项“新政策”。“新政策”旨在“按照西法”“改革中国的行政部门”，方法是至少聘用四个客卿在外务部、陆军部、海军部和财政部充当顾问，并选拔年青有为的中国学生在顾问底下工作，准备以后接替。^①这项“新政策”虽意在革新，但若实行，必有很大危险，会使外国侵略者乘机控制中国政府。它遭到了张之洞的冷遇。

1896年，容闳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相识亦当在此前后。^②象容闳这样了解西方的人当然是康、梁等人所要联络请益的，而容闳则又本能地深为康、梁等领导的“伟大的维新事业”^③所吸引，再加上他们都是广东同乡，因而很容易接近。容闳在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时期的主张和活动有两个基本方面：

一、在康、梁的赞助下试图实现自己久已怀抱的维新计划，即创办银行和修筑铁路。

容闳在太平天国提出的七策中就已说到创办银行。1886年他

① 容自传，第230页。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第一册第64页；容自传，第238页。

③ 容自传，第238页。

又与驻美公使张荫桓讨论了如何办银行。^①十年后，他还以银行计划作为解救甲午战后危局的方案之一。他认为：“银行仿自泰西，英、法诸国，屡经改章，愈变愈精，要以美国为最善。”^②因此，他特意翻译了有关美国银行的一些章程法规，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增损修改，拟订了一系列银行章程和有关条陈。^③容闳的银行计划虽得到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赞同和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的支持，但终因遭到官僚买办盛宣怀的阻挠而未能实施。

在六十年代上总署的条陈中，容闳早已提到修筑铁路。1896年上半年，他又在计划营造铁路，认为是救亡图存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渐臻强盛而不至终居人下”，他提出：“若任职道前与（美）商借四百兆两，利定轻于俄、法，将俄、法、日款一并清还，余以办理练兵善后事宜，以抒目前。但须准美商筹资帮造中国全境铁路，俾利源日开，借款有着，五十年不必另贾一文，另创一议，四百兆本息可以清还，并铁路胥为我有。”^④他还专门将《变通招股》的条陈进呈总署^⑤，请求允许借外款。他认为只要出让全国铁路修筑的利权，就可举借一笔大款，用来还债和处理善后事宜，而且年限一到即可将铁路利权收归“我有”了。这个计划未得到总署的批准。这并非是什么两全其美的方案，相反，是弊端极大的冒险计划。历史证明，列强加紧侵略、压迫中国，使中国加速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攫取中国的铁路利权和控制中国的铁路经营而达到的。但是，包括容闳等维新派当时却看不清这些危险性，出于饥不择食和天真的幻想，他们提出了依靠外资修筑铁路。

这种天真的幻想在戊戌变法时一直支配着容闳。1897年，容

① 张荫桓：《三洲日记》，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275—277页。

② 容闳：《银行总纲四条》。

③ 共有《银行总纲四条》、《总行章程十二条》、《分行章程二十四条》和《续拟银行条陈六条》等，分别刊于《时务报》第九、十册。

④ 《录容观察闳上总署条陈》，《闽省会报》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第2357—2358页。

⑤ 《容观察闳铁路条陈》，《时务报》第十册。

閻转而提出专修津镇铁路，1898年（光绪廿四年正月廿一日）得到了光绪帝的批准。^①但是，津镇铁路一方面要通过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省，因而遭到德帝国主义的竭力反对，另一方面因与芦汉铁路会有竞争而遭到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坚决反对，终于未果。

容閻的银行、铁路方案，虽对美国存有严重的错误认识和幻想，但却体现了他的爱国精神和维新宗旨，属于当时维新运动的范畴，因而得到了康、梁的支持。梁启超任主笔时的维新派喉舌《时务报》刊载了容閻有关银行、铁路的几乎全部章程和条陈，予以大力宣传，一段编者按语认为，容閻“所定银行章程，妥密精当，最无流弊。至办铁路，但借西人之资，即以铁路余利为息，并按年除本，逮廿年后，即可本利清还，尤为权自我操。”^②康有为自说：“容乃请筑津镇铁路，吾实助之，奉旨允行。”^③

有的同志认为容閻办津镇铁路是由美国资本家所“怂恿”，而容閻则是“替美国资本家们在中国出谋划策”，充当了“为美国出力”的买办。^④但他们都未拿出确凿的根据。容閻的铁路方案也许会受到某些帝国主义分子伪善言词的影响，这些帝国主义分子表面装作热心中国的维新事业，而骨子里却在为其侵华利益作盘算。即便如此，也应当对容閻全面考察和具体分析，不据可信的史料便对他遽作如上结论，则缺乏说服力。事实上，代表美国资本家利益的美国政府，对容閻经办津镇铁路并不支持。在遭到德国政府的反对后，容閻曾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向驻京美国公使田贝要求美国政府给予支持，企图“以夷制夷”。但是1898年4月14日美国国务卿约翰·谢尔曼给田贝的外交训令，却以否认容閻的美国公民资格作为答复，给容閻当头一棒。^⑤

① 《总署奏办津镇铁路疏》，《时务报》第十册。

② 《时务报》第十册。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21页。

④ 孙毓棠：《抗戈集》第181—186页。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100—101页持同样观点。

⑤ 小艾德蒙·H·沃西：《容閻在美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34卷3期（Edmund H. Worthy, Jr., Yung Wing in Americ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XXXIV, No. 3）。据纽海纹法院归化记录，容閻于1852年10月30日归化为美国公民。

二、热情赞助康、梁等人的维新活动并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

康有为发起保国会的第一日，容闳曾到场。^①“百日维新”时，他的“总部成了维新派首领集会的地方”。^②在维新派面临慈禧等顽固派反动集团发动政变的前夕，他曾参与了营救同志的谋划。^③政变发生后，他曾致函李提摩太，请求营救梁启超。^④

至于容闳对康、梁的影响，可从康、梁自己的叙述中看出一些。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非常推崇容闳，说他“学问最优”。^⑤康有为的自述更反映出容闳对康、梁等人的影响已关系到若干变法的重大方案。康说：“今统筹大局，非大筹五、六万万之款，以二万万筑全国铁路，限三年成之，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立各省各府县各种学堂，沿海分立船坞、武备水师学堂，开银行，行纸币，如此全力并举，庶几可补救。……既与常熟（翁同龢）言，荐容纯甫熟悉美事，忠信可任借款。又草折二份，交御史宋伯鲁、陈其璋上之。枢垣疑其不能行，留中，真可惜也。”^⑥

宋伯鲁上于1898年3月9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的《请统筹全局折》和陈其璋上于前日（二月十七日）的《请再向美国借款以相牵制而策富强折》^⑦，即是上述康有为所草，由康交他们分别上奏的。宋折提出“募开一大公司，集款数万万，准其开办各省铁路矿务，而责令报效七事”，并荐容闳去“招集美商办此”。所谓“报效七事”，即指购铁甲船、设陆海军工艺学堂、办枪炮厂、筑炮台、创银行、用洋将练兵等项维新事业。陈折则从“设法自保，牵制各国”出发，也提出由容闳去美借款，以筹办“七事”之类。

从容闳担当赴美借款和“报效七事”的重任来看，可以断定，这些主张是经过容闳与康、梁等维新派领袖筹划决定后才提出的，

①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第一册第9页。

② 容自传，第241页。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61—162页。

④ 《康南海墨迹·程清跋》，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141页。

⑤ 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85页。

⑥ 《康南海自编年谱》，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61—162页。

⑦ 两折均存第一历史档案馆。

也是变法维新的重大方案之一。再把这个方案与前述容闳的各种计划、主张加以对比,可以看出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折射出容闳对康、梁等人的影响。容闳在戊戌变法维新运动中的作用与地位,当然远不能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相提并论,但他也不失为一个重要人物。事实上早在1898年5月,容闳就已被顽固派视若大敌之一。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亲自出马,在参折中说:“又闻张荫桓与其同乡人道员梁诚、容闳等,与洋人时相往还,行踪诡密。该侍郎本译署大臣,乃与梁诚等串为一局,国家之密谋大计,何一不可输于洋人……”^①政变后,容闳也被追究撤差,只得出逃。

戊戌变法时,容闳年已七旬。他大康有为三十岁,大梁启超四十五岁,不仅在思想上是维新运动的先驱之一,而且还以康、梁的尊长兼同志的身份投身于变法维新运动,对康、梁有过一定影响。

(二)

1900年8月,唐才常等人利用义和团在北方掀起反帝高潮的良机,欲在长江一带发动自立军起义。这次起义虽情况复杂,但实际作用是在“勤王”的旗号下打击清政府,与惠州起义南北呼应,是应当被肯定的一次爱国性质的起义。起义前,7月26日,唐才常等人曾在上海召开“国会”,以作联络、号召各派力量和奠定起义后组建政府的基础。

容闳积极参加了这次起义的核心筹划工作。上海国会召开时,容闳被公举为会长,他在会上“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②容闳在自传中说自己创立了国会,与会者章炳麟也说:“唐才常知时可乘也,与侨人容闳召集人士宣言独立,然尚以勤王为名,部署徒众,欲起兵复口”,又说发表的宣言是“容闳手笔”。^③当时国会推容闳“主外交”,他曾设法争取英国的支持;也曾运动张之洞“联合长江各省”“成立中

① 《徐桐光绪廿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参张荫桓贪奸误国折》,存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 孙宝瑄:《日知录日记》,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540页。

③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105、110页。参见《唐才常集》1980年中华书局版第277页。

国独立政府”；^①又曾密购偷运自立军的起义军火。因此，张之洞在镇压自立军起义时，便把容闳与康有为、唐才常并列为“勾匪作乱，私运外洋军火”的要犯。^②

参加上海国会和自立军起义的人，政治面目颇为复杂，既有维新派的左、右翼，也有革命派或正开始向革命派转变的。容闳属于正开始向革命派转变的维新派左翼。他当时的政治主张主要是：一、用武装起义来推翻清政府，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二、幻想以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全部条约来与列强妥协并得到列强的支持；三、联合康、梁等维新派、孙中山和杨衢云等革命派，并争取包括张之洞、李鸿章等汉族官僚和其他各派力量。

第一、二项主张明确表述于容闳亲笔起草的国会对外英文宣言。美国学者周锡瑞从英国档案中找到了这份宣言，他写道：“载明为1900年7月26日的一份宣言……许诺一个立宪政府，‘它的基本纲领是英国政府的不成文宪法里的大宪章’，由陪审员审判，实行人身保护令的权利，以及承认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所有条约。为了实现其改良主张，他们建议，替政府聘请外国顾问。为了达到这一切，他们愿意追随当时正准备进军北京以镇压义和团并惩罚其在朝廷的支持者的八国联军。议会决定：

我们的坚定信念是：对现时复杂问题的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联合列强，废黜慈禧太后及其老朽顽固派和反对派同僚，恢复维新改良代表人物光绪皇帝的权力。”^③

为了实现他上述第三项主张，容闳曾频繁地活动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

戊戌变法失败后，容闳与康梁一派的关系仍一直很密切。如

①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110页。

② 叶德辉：《觉迷要录》卷二。

③ 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1982年中华书局版第30页。

康有为出逃后，曾致函李提摩太，并附函容闳。^①梁启超在1898年亡命日本不久，在与日本外务省参事官志贺重昂的笔谈中，说到他们有一个联络英、美形成一个“日清英米(美)四国联盟之局”的方案，并说为达此目的，康有为将与容闳远赴英美活动。^②容闳后来虽未随康去英、美，但也说明，他仍在参与康、梁一派重大方针政策的决定。1900年3月底，容闳在新加坡与康有为磋商大事。^③当时，康、梁一方面寄希望于唐才常在长江一带的起义，另一方面也在谋划从广东开辟一个战场，计划在夺取广州后进行北伐。容闳与康磋商的就是这两件大事，在康、梁看来，容闳是一个“资赞画、备交涉”的不可缺少的“亲信之人”，尊称以“纯公”、“纯老”。^④容闳在上海国会被公举为会长，显然有康、梁一派的积极拥护。

与此同时，容闳与革命派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戊戌政变后，容闳对清政府的幻想渐趋破灭，于1899年迁居香港后，开始与兴中会人员交往。1900年3月31日和4月2日他与兴中会员谢纘泰在香港讨论了政治形势。在“倾心交谈良久”之后，两人对“在能干的基督徒领导下的联合、合作方针”表示一致同意。4月3日，由谢纘泰安排，容闳与杨衢云“就加紧联合和合作事宜”进行了“秘密会谈”。这个时期兴中会正在谋求与康、梁合作，谢对此主张甚力。谢先后见过康广仁、康有为，并就合作事与他们达成过初步谅解。谢甚至提出让容闳来当会长，以调整联合后的各党派之间的矛盾关系。^⑤谢的提议一方面出于联合各党派的主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兴中会内部孙中山一派和杨衢云一派之间的矛盾。孙、杨两派从开始携手合作建立香港兴中会起，就因争夺会长而发生矛盾，1899年孙派在香港建立兴汉会，迫使杨衢云辞去兴

① 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14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05页。

③ 〔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94页。

④ 梁启超：《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三月二十四日致南海先生书》，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第二册第200、211页。

⑤ 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ngKong, 1924)。

中会会长职，确立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对此，杨派的谢纘泰非常不满，“遂有拥容为首领之意”。^①但至同年8月，甚至孙中山也认为可推容闳为领袖，联合各派力量反清。他在日本横滨对人说：“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料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②就连不太服人的章炳麟也在1900年8月8日的一封信中表示对容闳十分敬仰，说他“天资伉爽，毫益精明，诚支那有数人物。”^③

除了与康、梁和孙、杨两大派接触外，容闳还努力与其他政治势力加强联络。如他曾邀请郑观应参加上海中国议会的创办，但郑怕招谤惹祸，未接受。^④1900年1月下旬，经元善因领衔致电清廷抗议“废帝立储”而触怒西太后，经清政政授意被葡萄牙巡捕拘押于澳门，容闳曾设法营救经。^⑤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内田甲的报告，孙中山曾说：容闳声望素著，富新思想，为实现改革中国计划曾恳切函陈李鸿章，并促孙归国。^⑥那么，容闳还在设法联络李鸿章。至于运动张之洞据长江独立之事，前已述及。

1900年是中国被瓜分的危机最大、政治局势动荡剧烈的一年。在此严峻时刻，容闳不顾七十二岁的高龄，不惜牺牲生命，为了拯救祖国，积极配合唐才常创建上海国会和发动自立军起义，十分活跃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此时，容闳已放弃了走上层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120页。关于孙、杨两派关系，另有拙文《兴中会时期的孙杨两派关系》专门论及，该文已收入《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8页，1981年中华书局版。

③ 《中国旬报》十九期附刊“鼓吹录·论说”（庚子年七月十五日）。

④ 盛宣怀档案：《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五日，转引自汪熙：《论郑官应》，《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⑤ 《容闳致经元善函》和《容闳致港督书》，见经元善：《居易初集》卷二第73—74页。

⑥ 转引自吴相湘：《容闳欣见民国肇建》，《民国百人传》第一册，台湾出版。

路线进行维新的幻想，而主张暴力反清、依靠会党力量。^①同时又竭力主张各派联合，壮大队伍，共举反清大业。虽然他的政体主张还是君主立宪，但他的武装反清和各派联合的主张是与革命派一致的，而在维新派中又很有名望，因此，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便被维新派、革命派等政治势力分别拟举为担任名义上的领袖人物。这也说明容闳在当时是较有影响的人物。

（三）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容闳又逐渐与倒退为保皇党的康、梁一派划清界线，最后成为主张民主立宪共和国的革命者。

1900年9月上旬，容闳避难逃往日本，在海轮上巧遇孙中山，并同行至东京、神户、横滨等地。^②通过这次接触，他便倾向于支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1901年，容闳曾对青年刘成禺说：“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美）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船货，其举动何殊义和团？……孙逸仙……宽广诚明有大志，予助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他日见面，汝当助其成功。”^③这段慷慨激昂的谈话，标志了容闳的思想已发生很大转变。上海国会时，他主张联合列强，甚至提出自立军随同八国联军进攻义和团和北京；现在他认识到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和伟大的历史意义，把义和团运动与美国独立战争相提并论。1900年4月，他在与谢纘泰的谈话中曾说孙中山“太轻率”^④；现在他认识到了孙中山人格和思想的伟大，喻之为华盛顿、富兰克林，教导青年们赞助孙中山的事业。容闳读过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回国后同情太平天国革命而去天京出谋划策，美国南北战争时又曾去华盛顿报名当志愿兵，这些说明其思想中本不乏激进因素。尤其是在戊戌变法后，他对清政府的幻想渐趋破灭，自立

① 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民报》第24号。

② 《宫崎滔天全集》日文版第五卷第673页；《孙中山年谱》1981年中华书局版第48—49页。

③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114—115页。

④ 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军起义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又促使他更倾向于革命。不久，他就参与了谢纘泰等人谋划的兴中会第三次起义，即“大明顺天国起义”。

杨衢云被粤督德寿派人刺杀后，兴中会内部杨派主要闹矛盾的谢纘泰正式另树一帜，单独筹划这次起义。1901年9月26日，谢与李纪堂商定推容闳为起义后将成立的临时政府总统，洪全福负责军事，由李纪堂担当全部军饷，开始了起义的实际部署。他们预定1月28日夜（阳历壬寅除夕）在广州发动，但在举事前几日消息泄，未及发动即遭镇压。

容闳从1900年9月至1902年5月，大部分时间都居住于香港，与谢、李过往甚密，对于谢欲“在广州起义，亦极表同情”。^①并且为了在外交上争取国际的声援，尤其是争取美国的支持，容闳决定再次赴美，于1902年5月16日离港，6月12日抵美国旧金山。9月19日容闳收到谢纘泰写于8月13日的信，其信要求容闳“在美国组织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支持。”9月21日容闳复函说：“我已准备好在世界此端，尽我最大能力来满足您世界彼端的要求。尽快把暗号或密码转送给我，这是我们通讯必不可少的附属品。”^②12月19日容闳收到了谢的信和密码，12月22日他复谢信。^③这些说明：容闳与闻、支持了革命派的这次起义，并努力在美国为之积极活动。

但当时他仍主张联合各派力量共同推翻清政府，故在支持革命派的同时也还与康、梁有所联系，这当然与他尚未认清康、梁保皇倒退的实质也有关系。据1902年容闳日记所载，赴美途中，他曾于5月27日在日本横滨与梁启超、冯镜如、冯紫珊宴晤，此后又与梁启超和保皇会保持通讯联系。1903年梁启超游美时，还特意拜访了他^④，1905年康有为也去美国拜访了他。那时，他曾参与美国军事学家荷马李和财界人士布思帮助康、梁筹款和训练维新军等

① 陈春生：《壬寅洪全福广州举义记》，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16页。

② 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③ 容闳：《1902年日记》，英文未刊手稿，藏美国哈佛燕京格致图书馆。

④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96页。

活动，直到1908年还幻想使同盟会、保皇会及其他秘密团体联合发动起义，来推翻清王朝。^①

然而，革命与保皇在宗旨上毕竟水火不能相容，容闳思想上的革命倾向同其实践上与保皇派保持的关系十分矛盾。这一矛盾在他身上存在很长时间，从1908年起，矛盾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和保皇派的日益倒退更趋尖锐，终于使他毅然与康、梁决裂，走向了革命。

1908年7月14日容闳致谢纘泰信，建议维新党联合起来，并且“谴责了康有为和他的保皇党”。1910年4月13日，他在致谢信中“激烈痛斥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并谈到他曾会见孙中山。^②

从《布思文书》^③所存文件看，1909年1月，容闳在致布思和荷马李的信中，并在与布思友人阿伦的会晤中多次指出康有为不可信任，说康并非是一个靠得住的维新者，谴责康曾将在美国获得的捐款中饱私囊；认为孙中山是所有人士中最可信赖的，在广东孙有很大的力量，我们应当帮助他实现其计划和理想。容闳当时还提出了一个叫做“红龙——中国”的计划，估计约需500万美金、十万支枪和一亿发弹药，以便在中国进行推翻清政府的武装斗争。经容闳的介绍和安排，孙中山与荷马李、布思等建立了通讯联系，并于是年底与布思之友阿伦在纽约进行接触。同时，容闳函约布思和荷马李在洛杉矶附近的长堤与孙中山举行会议。2、3月间，孙中山与荷马李、布思在洛杉矶多次会谈。与此同时，孙中山与容闳亦有晤谈和函商。如在收到孙中山1910年2月14日寄自旧金山的信后，容闳立即复函，建议孙中山在与荷马李、布思的会谈中准备讨论“至少向银行借款150万美金，并再借款200万美金以备急需”、“组织临时政府”、“加强武装力量的领导”和“建立

① 罗香林：《早期留学美国的容闳与中华民国创建之关系》，《东方杂志》复刊9卷5期，台湾出版。

② 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③ “Charles Beach Boothe Papers”，该文书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另有〔美〕蔡平：《荷马李与中国革命》（E.L.Chappin, Homer Lea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50）未刊打字稿 所引荷马李的有关文书，可与布思文书相互印证。

海军”等问题。^①在收到孙中山2月21日信，得知孙与布思已在洛杉矶会晤两次后，容闳致函布思，催他设法借款。^②3月28容闳致函布思，提出了一个更为详细的借款方案：借款总数为一千万美金，分五次付款，为期十年，年利为15%，一旦革命党在国内取得一省的胜利，将立即委任美国财务管理人为中国海关税务人员，并出让若干专利以作借款的补偿。容闳还在此方案中，较详地谈到了临时政府的筹组。政府完全仿照美国，设正副总统、国务卿和各部部长，准备聘请外国人充当顾问或部长。荷马李被提议担任陆军部长等。^③孙中山与荷马李、布思的会谈制定了一个新的起义计划，内容大致是：一、暂停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准备未周的起义，集中人力财力，发动大规模的起义；二、以孙中山的名义，委任布思为中国同盟会驻外国全权财务代办，向纽约财团借款，并由孙办理一个由国内各省革命党代表签署的文件，作为借款的证据；三、运送在美国训练的军官若干，以充实革命力量；四、借款总额为350万美金，分四次支付；五、筹组临时政府。对于这些会谈的牵线、安排和会谈形成的计划，容闳所起的作用很重要。

后来布思的借款并未成功，但这些会谈对孙中山以后的指导思想和实际部署都有一定的影响。1910年6月，孙中山抵日本，与黄兴、赵声、宋教仁、谭人凤等商议，落实了上述计划的第一、二项，开始谋设秘密机关，统一各省革命团体的起义活动，集中人力和财力准备发动后来的“三·二九”广州起义。

孙中山在推翻清朝、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致函容闳，充分肯定其革命劳绩，称他为“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的“老同志”，并说：“当此破坏之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才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退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

① 1910年2月16日容闳致孙中山函，见《布思文书》。

② 1910年3月4日容闳致布思函，见同上。

③ 1910年3月28日容闳致布思函，见同上。

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①可是，容闳从1910年5月起即患中风，孙中山函到达时，已卧床不起，不久于1912年4月21日溘然长逝于异乡的美国了。^②

即使在病危之中，容闳仍深深怀念祖国，同时也深深地焦虑着革命和革命后建设的若干问题。武昌起义爆发后，容闳接连于1911年12月19日、22日、29日写了三封信，又于次年1月14日和3月23日写了两封信，寄给国内友人，它们表达了他一生最后阶段的政治见解和革命立场，也反映了他对新共和国安定民生和使用、培养人材等问题的关切以及他渴望回国效力的爱国之心。^③

在一封致全体革命者的信中，容闳写道：“……你们代表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那些近三百年来深受压制的人们——高呼着共和国，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去赢得自由和独立。既然你们已经把这些满洲人踩在脚下，那么也不要让那些政治两面派（不管他们的代表多么能干和善于花言巧语）引诱你们离开坚定的初衷，即召唤共和国的到来。”他认为必须毫不妥协地坚持共和制，他还密切注视着袁世凯利用上海和议、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玩弄阴谋的情形，故一再告诫革命者不能听信袁世凯，他说：“无论袁世凯通过唐绍仪的嘴皮说出什么来，都不要相信。你们应当认定他们全都野心勃勃。袁世凯是什么东西？不就是他在1898年出卖了他的主上光绪皇帝吗？叛徒岂能被信任？”最后他呼吁革命者“应当彼此团结得比亲兄弟还要紧密，这是绝对必须的”，因为内部纷争和内战“定会招致外国干涉，这意味着瓜分这个壮丽的国家，而英明的上帝已把她留给中华民族，以建立一个模范共和国。”^④

在致谢纘泰的函中，他说：“我目前所焦虑的是，在北京的

①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43—144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高宗鲁：《有关容闳的史料问题》，《传记文学》36卷第3期，台湾出版。

③ 这些信都是用英文写的，头三封信全件收于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后两封信只是片断，系杏子根据谢纘泰在《共和西报》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译出，刊于《太平洋报》1912年7月29日、8月1日，题为《容纯甫先生之遗训》。

④ 《1911年12月19日容闳致全体革命者函》。

残暴列强将会对袁世凯、唐绍仪一伙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他们又将千方百计来左右上海会议，使之采纳君主立宪制，并由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这就正如满清统治复辟一样腐败。新中国应当掌握在真正的中国人手中，而不能落入让欧洲掠夺者干涉我们内政的两面派和叛徒之手。”^①

这种见解在当时堪称清醒、深刻的真知灼见，而这种立场则体现了他对革命的忠诚和对祖国的热爱。在另一封致谢的信中，容闳曾要求谢在去南京出席孙中山就职典礼时转达他对孙的衷心祝贺，并表示他十分渴望能回祖国亲眼见一见梦寐以求的新共和国。^②在1月14日的信中，容闳关切地询问：新共和国如何来解救因“扬子江流域洪水为灾”而造成的“数百万嗷嗷待哺之”“饥民”？对于因清朝灭亡而可能“失其庇依，资斧无着，有辍业之虞”的各批留学生又作如何安排？并认为“吾国女学甫在萌芽，宜筹巨款”而“选优秀女子令入学校受教育，养成种种有用人才”，这是有关“国家根柢大计”而不能“迂远忽之”的。^③直到逝世前一月，容闳还在信中表示愿为“助纂民国宪法”而“竭力”。^④特别感人的是，他在“易箴时，犹嘱其二子觐形、觐槐，弃所营业，回助祖国”。^⑤特韦契尔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对于美国友人的赞扬，容闳完全当之无愧。

主流·特色·缺陷·局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容闳在社会实践方面从投身维新进而到参加革命，在政治思想上由主张君主立宪转而拥护民主共和，其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显著地体现了近代爱国主义和学习西方

① 《1911年12月22日容闳致谢缙泰函》。

② 《1911年12月29日容闳致谢缙泰函》。

③ 《1912年1月14日容闳致某友人函》。

④ 《1912年3月23日容闳致某友人函》。

⑤ 容联芳：《容闳传》，《容氏谱牒》卷十五。

的时代精神。因此，毫无疑问，容闳是中国旧民主主义时期值得一书的先进人物。

应当指出，容闳作出了不少首创性的历史贡献，具有维新先驱者的历史地位，这是他的特色之一。

人们往往把容闳与冯桂芬、王韬相提并论，称之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其实，冯桂芬只是因为师承林则徐而具备一些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素质而已。如在写成于1861年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冯倡导“自强”和“博采西学”，对以后的维新思想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同时又明确主张“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中体西用”的洋务派主张即源于此。约在1863年或稍后，王韬曾与黄胜合作译编《火器略说》，主张学习西方的仍只是“船坚炮利”，未超出洋务思想的框框，他的主张变法自强，则是在1874年主编《循环日报》之后，而容闳则早于王韬十多年就在天京提出了七策这样的维新方案，不愧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最早倡导者。这是因为：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近代维新思想除了从地主阶级改革思想发展而来或从洋务思想分化而出外，还有直接来源于外国资产阶级思想的，而且后者比前者出现得更早（可是这方面却未引起我国学术界应有的注意）。容闳即是最早的一例。

洋务运动时期容闳的首创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的活动和主张对洋务派有积极的影响。如1863年容闳提出的访求“制器之器”的主张，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实施，曾一度成为洋务派热衷的口号，从而开创了引进机器工业的风气。再如容闳提出附设一所机械学校于江南制造局的建议后，曾国藩便在1868年的奏折中提出在制造局“另立学馆，以司翻译”，并说：“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①江南制造局后来确实翻译了一批数量最大、质量最高的西书，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力量。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也是在容闳的倡导下，由洋务派主

^① 《新造轮船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三。

持实现的。此后，学生源源出洋，形成留学热潮，对近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维新、革命运动的向前推进，都有直接的影响。容闳倡导的第一批留美学生，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壮举，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新起点。对于维新运动来说，容闳在天京提出的七策和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维新主张，便成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思潮主曲的前奏，而容闳自己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进而参加了戊戌变法维新运动。

特色之二，是容闳有一个值得称道的晚节，他始终顺乎历史潮流的滚滚向前而不断前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很多维新派，甚至起过巨大进步作用的领袖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人，后来却主张倒退，阻碍革命，起了很坏的作用。容闳之所以与他们不同，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他没有象康有为等人那样背负着极其沉重的传统封建主义包袱，相反，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则在他头脑中颇有根底。

不过，还应当指出，容闳在历史上的成就和影响还远不及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孙中山。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他身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局限。

从缺陷方面看，容闳由于一生中很长时间生活在美国，又缺乏中学根底，甚至不怎么能运用中文写作，因此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比较肤浅，而无论在中国社会中还是在海外华侨社会中都缺乏稳固的根基。这些原因造成了他提出的主张、方案往往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有一定距离：一方面，其先进性有时超越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呈现了很大的空想色彩，如在天京提出的七策就很少有被实施的可能；另一方面，有时又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性迫切要求，如甲午战后他只提出借洋款、筑铁路、办银行和改组政府等方案。这些显然是非常不够的。范文澜同志曾说，戊戌变法时有过一个“容闳系”。^①实际上容闳虽颇有名望，但只有名望而已，他始终未自成一系。他通常热衷的活动方式是，结识联络各种头面人物，向他们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方案，从而对他们产

^① 范撰《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12页，1962年人民出版社版。

生影响。他也确曾不同程度地影响过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和孙中山等人。然而，他在社会活动方面，显然缺乏康有为、孙中山那样的组织才能和政治家的气质；在思想活动方面，他提出的各种主张和方案通常只是着眼于具体事物，如创办银行、派遣留学生、建立各类新式学校及改组政府等，显然还只是一些行动方案，缺乏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因此，容闳既没有象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那样的政治理论著述，也没有象严复那样的译著，可以拿出来影响社会。而且就是这些具体的行动方案，也往往流于简单照搬西方的东西，特别是以美国为模式，缺乏中国的民族风格，这便使它们的影响力和生命力都受到很大限制。

从局限方面看，由于所受的纯粹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和长期在美国生活，使容闳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思想的消极影响，表现得非常突出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西学与中学的矛盾关系处理失当。在容闳看来，应当“鼓励”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文学、科学和宗教”，^①这无异是主张全盘西化，甚至不惜为此排斥中国的固有文化，而不管它是糟粕还是精华。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偏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而且，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很大的自身继承性和很大的稳定性，悠久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尤其如此。因此，西学输入中国，若不能与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很好地有机结合，其影响必然有限。容闳却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也难怪，直到五四时期，不少提倡西方民主与科学、反对中国封建旧文化的进步人士也还发生这样的偏颇，往往为了泼出脏水，也倒掉了小孩。容闳另一方面的重大局限，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抱有严重的错误认识和幻想。就拿甲午战争后容闳向张之洞、康有为、孙中山提出的各种方案来说，总是少不了借外债、雇洋兵、聘用外国顾问等内容，特别是对美国的幻想尤甚。这些方案若真被实施，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将会导致引狼入室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渗透。容闳天真地认为，他们从事维新和革命，

① <1876年10月4日容闳致富兰克林·德克斯特·伊格函>，英文未刊手稿，藏耶鲁大学图书馆。

都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早已做过的事，理该得到西方的同情和支持。他不明白“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道理，做着“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①这种迷梦不只是容闳在做，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都在做。康有为曾向光绪皇帝推荐李提摩太当清政府的顾问大臣，孙中山也一直在努力争取英、日、美、法的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康、孙对容闳的一些主张和方案都是赞成的。这些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局限：它缺乏力量，因而软弱；它缺乏经验，因而幼稚。只是这些局限反映在容闳身上比较集中和比较严重罢了。

然而，瑕不掩瑜，这些缺陷和局限仍然只是容闳的次要方面。有的论著把这些次要方面当作他的主流，得出了否定容闳是先进人物的结论^②，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58—1359页。

② 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256—255、693页；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67、187页；王永康：《容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吗？》，《文汇报》1963年4月4日。